

美国间接统治的隐秘逻辑与代价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陈拯

面对美国霸权，为何不少国家选择妥协迎合，而美国又始终难以摆脱广泛质疑与反抗？在《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的缔造》一书中，国际关系学者戴维·莱克系统剖析了美国控制他国的运行机制，将其根源归结为20世纪以来美国逐步构建并不断扩张的“间接统治”体系。这种结构化的国际等级制，核心是通过介入他国内部政治，与亲美势力结成同盟，塑造并固化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外政策。作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它让美国不必直接占领即可实现全球范围的等级秩序，同时也埋下深刻矛盾与长期隐患。

国际等级理论是近几十年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转向，莱克是这一领域的关键学者。其200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已成为经典，该书提出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存在主权让渡与安全、经济收益交换的关系，交易成本决定等级形态。但这一框架偏重互利性，对强制力与具体运作机制关注不足。在新著中，莱克进一步完善理论：主导国通过识别、扶持并保障亲美集团，提供政权稳定、经济援助、军事支持与制度倾斜，使其即便民意基础薄弱、内部阻力较大，仍能持续执政并推行亲美政策。这一机制重塑了从属国内部行为体的决策逻辑，将其牢牢嵌入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

间接统治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收益算

计下的霸权策略。美国推行这一模式，意在保护关键资源、控制战略通道、维护区域影响力。但扶持盟友也易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卷入不必要冲突等，因此美国必须保持有效控制。相比直接占领的高昂代价与治理风险，间接统治依靠代理人、内政干预与制度约束，以更低成本实现战略操控，成为更“经济”的霸权工具。其策略选择取决于治理成本与战略资产价值：对资源丰富、地缘关键且治理成本较低的地区，美国愿意长期投入，如加勒比地区的金融控制、中东的石油安全维护。在具体操作上，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锁定军事供应链、绑定政策行为等方式，压缩从属国自主空间，确保其不偏离既定轨道。这套低成本治理术，构成理解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视角。

但间接统治也带来难以化解的内在矛盾，突出表现为两大负面后果。其一，美国一边宣扬民主，一边频繁支持专制政权。在间接统治逻辑下，亲美精英集团获益最大，本土反对派利益受损，对美不满持续积累。当亲美集团根基不稳时，美国往往默许甚至协助其强化专制统治以维持权力，这与美国标榜的价值观形成尖锐冲突，严重削弱其软实力，招致“民主伪善”的指责。其二，支持少数精英统治的做法，极易激发普遍反美情绪，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催生针对美国的跨国恐

怖主义，形成安全上的恶性循环。

莱克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细致考察了美国在不同区域推行间接统治的逻辑与后果。20世纪初，为消化过剩产能、控制巴拿马运河等战略要地，美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建立“非正式帝国”。通过扶持亲美土地精英、实施“金元外交”、接管海关并以军事干预为后盾，美国以低成本实现等级控制。但这种模式牺牲当地社会公平，激化反美情绪，造成社会撕裂，成为地区长期动荡的重要根源。

二战后，美国以“被邀请的帝国”身份进入西欧，目标是打造亲美、反共的稳定阵营。借助马歇尔计划，美国将经济援助与自由化改革、市场开放挂钩，推动欧洲一体化，并以北约提供安全保障，同时秘密支持反共力量，确保亲美政党执政。这一体系虽一度稳固，却始终面临盟友搭便车、殖民遗留冲突与自主倾向上升等挑战。

1979年以来，美国在中东构建“不完整帝国”，核心诉求是控制石油资源、守护战略通道、巩固对以关系。美国通过军事基地、大规模援助、武器出售与安全承诺，扶持沙特、埃及等亲美政权。但这些政权更关注自身存续与传统秩序，难以回应民众对经济公平与政治自由的诉求。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美国在多地建立的间接统治，虽无旧式殖民的赤裸裸占有，却同样以等级强制侵犯他国主

权，且常常事与愿违，反噬美国自身利益与国际形象。

当前美国实力优势相对弱化，外交困境日益突出，特朗普时期的“霸权掠夺性转向”尤为值得警惕。从间接统治理论看，这一转向并非战略断裂，而是原有等级逻辑的极端化与短视化。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控制与施压的核心手段，却放弃了维系体系必需的制度互惠与合法性建设，转向以个人及小集团私利为导向的“盗贼统治”，将盟友与伙伴视为可压榨的对象。这种做法虽可能带来短期利益，却严重破坏同盟信任，打破成本—收益平衡，推动盟友加快战略自主，对美实施对冲策略，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等级控制力。在亚太地区，美国同样依靠军事基地、联盟体系、技术供应链与相关经济框架，拉拢亲美政权与精英力量，试图维持间接统治以推进对华制衡。但盟友搭便车、经济自主倾向、地区民族主义与国内政治制约等因素叠加，使其亚太等级体系日趋脆弱。

总体而言，莱克这部著作以宏阔历史视野、严谨理论推演和鲜明现实批判，揭示了美国通过介入他国内政行使霸权的深层机制，阐释了这一模式对相关国家及国际秩序的长远影响，也为理解反美主义的根源、美国霸权的困境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



《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的缔造》
[美]戴维·莱克 著
刘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技术迷思下的劳动突围

上海财经大学新闻与社会高等研究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苏熠慧

《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以下简称《机器时代》)是身处技术浪潮中的人们思考技术与劳动关系的必读之作。该书以真实的工厂调研，既揭开机器霸权与技术迷思的真相，也为企业与社会提供了反思与方向。无论是身处职场的劳动者、关注技术发展的研究者，还是关心社会现实的普通读者，都能从书中找到共鸣与思考。该书让我们明白，我们警惕的从不是机器与技术本身，而是支配技术的资本逻辑与异化劳动的权力结构，技术的终极使命是解放人，而非支配人。

许怡写的《机器时代》扎根制造业工厂与运输行业一线田野，系统剖析技术、资本与劳动的深层关系，全书以机器霸权为核心概念，拆解自动化、智能化浪潮下“机器换人”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劳动异化困境，破除大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本书最核心的理论创新，是明确界定机器霸权的双重内涵。这一概念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被作者转化为劳动场域中更隐蔽、更高效的支配逻辑，包含两个关键层面：第一，机器在生产层面占据支配地位，成为生产流程的核心，岗位设置、人员分工、工作节拍全部围绕机器设定，工人从生产主体沦为机器的辅助者、看护者与故障补救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机器节奏，甚至丧失劳动自主权；第二，机器在观念层面垄断人们的认知，通过媒体宣传、产业政策、企业管理的共同塑造，全社会形成“机器至上”的单一认知，工人即便长期目睹

机器故障、低效、危险，也会将问题归因于自身操作不当、素质不足，主动认同“机器比人优越”，在无意识中被规训、被支配。因此，“机器霸权”转化为劳动场域的权力逻辑：机器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一套支配劳动者、规训劳动过程、占据生产核心的权力体系。与传统暴力强制式管控不同，机器霸权是一种“认同”式治理，它不依靠鞭子与强权，而是通过内化式控制，让劳动者在无意识中配合资本主导的技术逻辑，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这种非暴力的“认同”式治理，让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妙程度。

此外，许怡所作的扎实的田野调查，戳破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三大机器迷思。第一个迷思是机器一定比人更快。书中揭示，熟练工人在特定工序中的生产速度与机器相当，甚至更快，机器的核心优势并非绝对速度，而是生产节奏的稳定性。工厂使用机器，能够规避工人离职、技能波动带来的生产不确定性，满足资本对生产稳定性的极致追求，尤其是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控制。第二个迷思是机器生产品质一定更高。事实上，面对柔性、黏性材料等复杂工况，机器易出现抓取失误、涂胶不均、压坏原料等问题，不良率居高不下，最终仍需人工补救；高端产品的精细工艺、品质把控仍依赖高技能工人，机器无法完全替代人工的经验与灵活性。第三个迷思是机器生产效率一定更稳定。自动化设备并非如宣传中那般可靠，报警、故障、卡料时有发生，短时间内可出现多次异常，严重时导致整

条产线停工，远非24小时不间断稳定运行。破除这些迷思，并非反对技术，而是承认机器的局限性，回归以人为本的机器观。

书中揭示的机器霸权与技术迷思，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并不乐观。技术升级并未直接让劳动者受益，反而导致劳动者分化，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其一，技术升级可能造成劳动者去技术化，原本需要熟练技术的焊接、抛光等岗位，工人被降级为机器帮工，技术含量、工资与补贴同步下降，而自动化操作看似高端，实则多为简单工序，缺乏真正的技术价值；其二，劳动强度并未随机器使用而降低，反而有所增加，自动化生产节拍被设为高速，工人在无工友协助的情况下，需全力追赶节奏，如厕、休息被严格限制，长期劳作引发身体损伤、职业健康风险上升；其三，工作条件未得到改善，工人操作机器时缺乏充足的安全防护设备，面临新的职业伤害风险；其四，岗位缩减与工人分化，机器引入导致流水线大量减员，被替代工人只能流向低薪工厂、返乡，或进入外卖、网约车、护理等行业，工人内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机器时代》不仅立足当下，也带领我们重新思考“技术为何”和“如何创建”更好的技术未来”这两个重要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该书揭示，技术发展从来不是中立自发的，如今的“机器换人”背后，往往是资本主导的利益选择。从工业机器人到无人驾驶、AI技术，大量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核心目标是取代人力、压缩成本、强化控制，而非解

放劳动力。该书对机器霸权和技术迷思的批判，帮助读者反思将机器置于人之上所造成的危机，进而重新审视“技术为人”和“技术向善”的人道主义目标，让普通劳动者看清自身被规训的认知困境，让企业意识到人的价值不可替代，这也提醒决策者制定政策时避免陷入“机器迷思”的陷阱。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书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尝试提出未来的可能出路。作者将全民基本收入、技术民主化、技术共产主义、劳动者团结四大策略相融合：全民基本收入为劳动者提供基础保障；技术民主化坚持以人为本，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通过集体智慧开发适配社会需求的多元技术；技术共产主义以马克思理想社会为基础，让技术成果全民共享，打破资本对技术的垄断；而劳动者团结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唯有依托劳动者的团结，才能完善制度保障，平衡技术发展就业保护，最终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

总而言之，该书以小见大，从微观劳动透视宏观结构，以现实批判指向未来改革。它既是我们理解当下劳动者困境的钥匙，也是构建“技术向善”社会的宣言。《机器时代》中的精彩分析不断警示我们，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技术霸权和技术迷思将成为每个劳动者可能面临的困境与陷阱，而要摆脱困境，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向善”背后的生产关系与所有权变革。



《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许怡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迪尔蒙到迪拜，读懂波斯湾五千年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马百亮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咽喉要道，这片海域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海运量，同时还承担着同样比例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这里的风吹草动，不仅牵动着全球能源格局与地缘政治走向，更直接影响着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而石油、天然气价格的飙升也层层传导至生产、运输与流通环节，推高食品、日用品等物价，让普通民众切实感受到地缘局势带来的生活压力。在此意义上，这片海域如今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中心”，而这恰与《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的原标题“The Center of the World”形成一种奇妙的呼应。

世人对这片海域的印象，似乎总与冲突、对峙、能源争夺紧密绑定，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兹以宏大的全球史视野与细腻的历史细节，打破了这种片面认知，让我们看见波斯湾作为文明枢纽、贸易通衢的本色，为我们解读这片海域的历史与当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不同于以往聚焦于波斯湾冲突或石油经济的作品，这部书以全球史“海洋转向”与“关联史”理念为指引，将波斯湾的历史置于人类文明互联互通的大背景下，勾勒出这片海域五千年以来的流动脉络与文明底色。

从古代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阿巴斯帝国、萨法维帝国、阿曼帝国，再到近代的葡萄牙帝国、大英帝国，直至如今的美国，周边帝国不断更迭，

对波斯湾的控制权也几度易手，但这片海域始终维持着区域性地方身份，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世界主义精神。就像作者所说，“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环境中，世界主义是常态而非例外，开放的市场往往是生存所需，文化多样性和经济交流不仅促进了变革，还创造了更深厚的历史”。

更特殊的是，波斯湾是传统认知中1500年全球化开启之前的“例外”。在人类前现代史，90%的地区都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依靠土地耕种维持生存与发展，但波斯湾地区却因缺乏肥沃的土地，无法大规模发展农业，于是当地居民将目光投向海洋，以进出口贸易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明。这种例外，正是波斯湾地区繁荣的根基——早在石油被经济开发之前，这里的财富就源于贸易的兴盛。从香料、丝绸、木材、黄金和青铜，到珍珠、宝石、阿拉伯马匹，这些物产沿着波斯湾的航道流转，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物质载体，也让波斯湾成为古代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

为了清晰勾勒波斯湾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变迁，弗洛姆赫兹借鉴了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的三段论视角，既关注长时段的地理、气候结构，也聚焦于中时段的帝国兴衰与经济周期，并通过六个具有代表性的港口城市来呈现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从巴林的迪尔蒙，到巴士拉、尸罗夫、霍尔木兹，再到马斯喀特与现代迪拜，每一座城市都是波斯湾流动历史的见证者，每一座城市的兴衰都与全球贸易的变迁紧密

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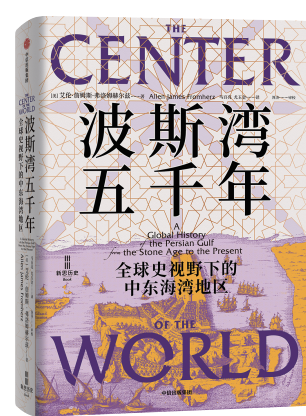
中世纪的尸罗夫更是波斯湾商业文明的缩影。这座港口城市在10至11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波斯湾的商业重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形成了繁荣的贸易网络。但尸罗夫的命运也与贸易紧密绑定，12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路线的变迁，这座曾经繁华的港口城市逐渐衰落，最终被历史遗忘。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枢纽，霍尔木兹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物产，不同肤色、信仰各异的商贾云集于此，共同塑造了波斯湾地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商业氛围。

这种开放包容，本质上是波斯湾商业文明孕育出的“策略性的宽容”。在这片以贸易为核心的区域，宽容并非单纯的道德选择，而是贸易利益驱动下的理性选择。弗洛姆赫兹强调，这种“策略性的宽容”贯穿了波斯湾的整个历史，成为这片海域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中世纪的尸罗夫，为了尊重印度商人的饮食习惯，当地人专门为他们设置了单独的餐桌，秉持着各守其俗、互通互利的原则；在葡萄牙统治时期的霍尔木兹，不同宗教的信徒可以自由开展宗教活动，商人可以不受宗教身份的限制，自由开展贸易；即便在近现代，这种宽容精神也得以延续，成为波斯湾地区文明交往的重要底色。正如弗洛姆赫兹在书中所言：“一座港口城市若没有贸易和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便会迅速衰落消亡，因此不同社会阶层都热衷于开放，并包容来自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多样化群体。”

这部作品最可贵之处，在于它跳出了

“冲突叙事”与“石油叙事”的局限，以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视角与整体史观，还原了波斯湾作为文明枢纽的本真面貌，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波斯湾长时段全球史研究的空白，更在于延续并发展了布罗代尔的海洋史研究范式——在其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以总体史观把握区域历史，将地中海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的地理—历史单元”，打破了陆地与海洋、国别与区域的界限，将地中海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事件视为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动态探讨各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关联。弗洛姆赫兹以同样的学术逻辑，将波斯湾构建为一个兼具地理整体性与文明关联性的研究单元，二者虽研究对象不同，但在学术理念、叙事框架与研究路径上高度契合，我们甚至可以说，弗洛姆赫兹之于波斯湾，恰如布罗代尔之于地中海。

从公元前两千年的迪尔蒙，到21世纪的迪拜，回望波斯湾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海域的兴衰变迁，更是人类文明互联互通的生动见证。今天，战争的威胁似乎又要将这片水域撕裂为敌对的阵营，作为全球化历史最悠久、互联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让我们明白：沙漠与海洋不是阻隔，而是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差异未必导致冲突，反而可以孕育出繁荣的共生；冲突与隔绝并非常态，开放与包容、交流与合作才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帝国的更迭只是历史的插曲，而人口、货物、思想的持续流动，才是永恒的主题。



《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
[美]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兹 著
马百亮 尤玉金 译
中信出版集团